

中国历史上的国计民生

陈锋 常建华 / 主编

杨国安 余新忠 / 副主编

中国历史上的国计民生

陈
锋

常建华 / 主 编

杨国安 余新忠 / 副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历史上的国计民生 / 陈锋, 常建华主编.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11
ISBN 978-7-5201-3183-4

I. ①中… II. ①陈… ②常… III. ①经济史-中国-近代-文集 ②社会发展史-中国-近代-文集 IV.
①F129.5-53 ②K25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74549 号

中国历史上的国计民生

主 编 / 陈 锋 常建华
副 主 编 / 杨国安 余新忠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宋荣欣
责任编辑 / 宋 超 赵 晨 汪延平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近代史编辑室 (010) 59367256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天津千鹤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31.75 字 数: 529 千字

版 次 /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201-3183-4
定 价 / 12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59367028) 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第一编 理论探讨与学科建设

开放与多元：新世纪中国社会史理论探讨与学科建设	常建华 / 3
重建百姓日用之学	刘志琴 / 36
社会文化史在行进	梁景和 / 47
源头活水：田汝康与中国历史人类学	刘 平 / 58
江西流坑村的考察历程回顾及其对历史名镇名村考察研究的 启示	梁洪生 / 62
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三十年发展趋势与瓶颈	李长莉 / 73
在生命的关注中彰显历史的意义 ——当今中国医疗史研究的新思考	余新忠 / 88

第二编 群体、生计与日常生活

催课抑或抚字：明代地方官面对国计民生的矛盾心态及其施政 实践	陈宝良 / 103
19 世纪初松江地区人类发展指数（HDI）试探	李伯重 / 133
清末民初武昌县中医朱仁甫的收入与生活	路彩霞 / 147
“东方芝加哥”中的“乡巴佬”：近代武汉农村移民的 底层生活	胡俊修 肖 琛 / 161

第三编 财政、经济与社会

折上折：明代隆万间的赋役折银与中央财政再分配	李义琼 / 189
清初的招商与盐商的承充	陈 锋 / 215
清代私盐市场之形成	
——以嘉道年间湖南南部私盐贸易为例	黄国信 / 238
清代图甲户籍与村落社会	
——以祁门县二十二都二图四甲王鼎盛户为中心	刘道胜 / 259
青州驻防八旗粮饷残册初步解读	潘洪钢 / 281
晚清妓捐征收与警察系统之建立	王 燕 / 301
“深浚”与“筑塘”：杨时与湘湖工程方式的选择	钱 杭 / 316

第四编 宗族与村落

从文书到族谱与方志

——以明代休宁瑯溪金氏为中心	阿 风 / 331
从同姓到同宗：宋明吉安地区的宗族实践	黄志繁 / 349
碑铭上的世系：明清鄂东南移民定居与家族世系的层累构建	杨国安 / 367
“百果台”：晚清民国闽北惠安祠的神诞供品及其文化与经济 意涵	李 军 / 391
控制与反控制：清代乡村社会的夜戏	姚春敏 / 408

第五编 社会秩序与基层治理

家族之耻：祖墓被占与争夺祖墓的诉讼	卞 利 / 423
清咸同年间河南乡村社会的军事化	
——以圩寨之修筑、战守为中心	孙 兵 / 435
北洋政府时期河南的战乱、匪患与地方社会	岁有生 / 452
市属委员会组织与近代中国城市社会治理格局变动问题初探	
——以上海、汉口为中心	方秋梅 / 462
“阶级成分登记表”：集体化时代农村社会研究的重要文本	行 龙 / 480

第一编
理论探讨与学科建设

开放与多元：新世纪中国社会史 理论探讨与学科建设

常建华*

改革开放以来，新时期的中国社会史理论探讨与学科建设的演变至今已经三十多年。^①其间，我发表了两篇讨论1986—2006年学术史研究状况的文章，^②兹作续篇就其2007年以来的进展加以论述，挂一漏万之处，敬请学者同仁补充指正。

通常认为，所谓社会史，就是研究特定时期或整个历史时期特定地区的人与人之间、人与群体之间以及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和行为模式，研究上述关系的演进及其所存续的外在环境的交换状态，进而揭示社会发展的内在轨迹。社会史既是专史，又是总体史。就中国古代社会史而言，人际关系、群际关系以及人与群之间的关系是其研究的三个基点，而且三个基点的展开都是遵循从下而上和自内而外两个视角进行的。古代社会史研究视野中的人与群体，首先是作为自然人而非政治人的人，是社会中的人而非制度与政权

* 常建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① 最新全面性的综述可以参见李长莉《近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史研究方法的探索》，《南京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唐仕春《视角、时空师承及交游——近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复兴与拓展》，《南京社会科学》2015年第12期；宋雪玲《近二十年来中国社会史研究述评》，《史学月刊》2015年第8期。

② 常建华：《中国社会史十年》，《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跨世纪的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8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

中的人，其次才是被追加了种种身份与地位的人。社会史的研究以民间群体与民间自然人为起点，有自己明晰的区界与内涵，以及自己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特色。^①

十年来的中国社会史研究日益呈现开放与多元的趋势。其中，历史人类学与区域社会史结伴相行，并植根于深厚的社会经济史，特色突出；社会生活史的研究也悄然变化，向日常生活史转变，并呈现社会文化史的特色；社会史面对生活，处理的主要是民间文献，社会史在文献处理、史料价值观上，变化也是明显的。民间文献、日常生活、历史人类学交叉渗透，这三个层面的理论与实践，推动着社会史学科的建设。

一 历史人类学与区域社会史

由华南研究发展起来的历史人类学，被视为已经形成学术共同体，并有刊物组织相关学者就此举行笔谈。^②这一学术流派的基本特征是强调从区域人群活动与相互关系中把握社会，重视在田野调查中解读民间文献。他们的学术追求，或许可以用科大卫所著《明清社会和礼仪》（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来表达：通过个案研究，对于统一的中国社会进行详细的论证，重建地方社会如何获取及认同自身特性的历史，以及地方社会如何接受并整合到一个大一统的文化的历史，展现中国社会的独特性和复杂性。科先生主持的“中国社会的历史人类学研究”项目，吸收了香港与内地众多从事田野工作的学者。^③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组织的“历史·田野丛书”自2006年以来推出十余种，彰显了

① 马新、齐涛：《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文史哲》2006年第4期。

② 《开放时代》2016年第4期。笔谈的文章有9篇：郑振满《华南学者的历史人类学：传承与互动》，陈春声《真正的学术群体应该“脱俗”》，张小军《学术：共同体的灵魂——以“华南学派”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为例》，刘志伟《以学为本以人隶之：学术共同体之道》，张侃《学术共同体的法度尺寸与经验感受》，黄向春《“学术共同”抑或“范式”：我所理解的“华南研究”》，张应强《学术共同体与中国人类学“多元一体”知识生产格局之构建》，郑莉《在田野实践中学习：学术认同感与方向感》，李宗翰《对人文科学学术共同体的一点浅见》。

③ 胡晓白：《中国社会的历史人类学第一阶段学术会议：回顾与展望》，《田野与文献》第74辑，2014。

自己的研究特色,^①也举办了不少学术研讨会。^②对如何理解一个区域,刘志伟以南岭为例谈了自己的想法,“从这样一种由跨区域的边界和人的流动去建立地区空间概念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取向出发,南岭就自然可以成为一个作为研究单位的区域”^③。

如何理解历史人类学的主张与工作,华南研究学者以及了解他们工作的学者发表了一些文章。历史学者与人类学者的对话有助于互相借鉴。^④黄国信、温春来、吴滔较早针对学术界对于历史人类学的不同认识,强调历史人类学的区域观念以及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方式,对近代区域社会史研究具有相当意义。“对于近代区域社会史学界,既强调时间与过程,也重视空间与结构,既讲究史料的分析考辨与校释,也注重‘参与体验’,从田野中直接获得研究材料,以及历史现场感,并强调分析各阶层、团体的不同历史表达的历史人类学,或许具有特别的意义。强调区域的历史建构过程,意味着研究者不能过分拘泥于僵化的时间或地理界限,而应以人为中心,以问题为中心,并超越所谓‘国家—地方’、‘普遍性知识—地方性知识’、‘大传统—小传统’之类的二元对立,在中国这样一个维持了数千年大一统体制的国家,这类界限其实是相当模糊的。”^⑤

他们借用研究盐史的实践表达出了理论追求与经验总结。主张中国盐史

① 第一辑9种,计有黄国信《区与界:清代湘粤赣界邻地区食盐专卖研究》,赵世瑜《小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黄志繁《“贼”“民”之间:12—18世纪赣南地域社会》,张应强《木材之流动:清代清水江下游地区的市场、权力与社会》,连瑞枝《隐藏的祖先:妙香国的传说和社会》,黄海妍《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清代以来广州合族祠研究》,温春来《从“异域”到“旧疆”:宋至清贵州西北部地区的制度、开发与认同》,郑锐达《移民、户籍与宗族:清代至民国期间江西袁州府地区研究》,郑振满《乡族与国家:多元视野中的闽台传统文化》;第二辑4种,计有陈贤波《土司政治与族群历史》,贺喜《亦神亦祖:广东西南地区的信仰与区域社会》,肖文评《白垩乡的故事——地域史脉络下的乡村社会建构》,谢湜《高乡与地乡——11—16世纪江南区域历史地理研究》。

② 如“明清帝国的建构与中国西南土著社会的建构”国际学术研讨会(广州,2010)，“流域历史与政治地理”学术研讨会(广州,2011)，“东亚人类学论坛——人类学与历史”(广州,2012)。

③ 刘志伟:《天地所以隔外内——王朝体系下的南岭文化》,吴滔、谢湜、于薇主编《南岭历史地理研究》第一辑,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总序。

④ 郑振满、黄向春:《文化、历史与国家——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对话》,《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5卷,商务印书馆,2007。

⑤ 黄国信、温春来、吴滔:《历史人类学与近代区域社会史研究》,《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5期。

研究也要在当今历史学的发展脉络下，超越既往范式，引入社会史的视角，重视区域研究，将其放回所在的历史脉络之中，并结合历史人类学“现场感”体验与民间文献结合的旨趣，考察制度运作与地域社会文化的结构过程，才能达到深化盐史研究，真正体现盐在历史时期重要性的目的。^①认为，近20年来，作为方法论的区域社会史研究渗透到历史悠久的盐史研究领域，在区域社会史看来，区域是长时期的历史因素积淀下来的各种地方性观念与朝廷对这些观念的制度化过程互动，所形成的存在于人们心目中的多层次、多向度的指涉。区域社会史研究不是囿于某个行政区划或地理空间的地区历史研究，而是把人当成区域的主体，根据人的活动来展开的区域的整体性历史研究。区域社会史视角下的盐史研究首先体现在一批将盐置于国家或地方历史的维度中，深刻揭示盐与财政、军事、经济、社会、文化以及地方历史进程的深层次关系的重要学术成果中；继而在一系列关于两淮、两浙、福建、广东以及云南、河东等地盐场的区域社会史研究成果里得到充分反映。这些研究成果，为学术界理解盐、盐场以及东南沿海、山西、云南地区乃至中国历史的总体历史变迁提供了参考。^②

历史人类学与区域史研究也会遇到各种问题，学者就此进行了讨论。张小也指出，其一，在区域社会研究中应避免“通史区域化”和“区域史地方化”倾向，认识到区域是一种历史建构，是研究者用经验来加以解构的研究对象。其二，对于“国家—社会”分析框架的使用须视具体情况而定，一方面应该认识到研究中国传统社会从典章制度入手是必要的，另一方面也应该认识到其他分析框架的重要性。其三，历史学应该展示历史的全貌和内在脉络，恢复历史的现场感。但是当代历史学无法离开社会科学，因此历史学研究应注意引入那些具有实践性的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这样才有利于学科内以及不同学科之间的对话。其四，民间文献的规模固然庞大，但是不应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有建设性的做法是找到恰当的方法。民间文献的搜集、整理和利用需要科学的方法，不应破坏其原来的系统，还应注意克服其

① 李晓龙、温春来：《中国盐史研究的理论视野和研究取向》，《史学理论研究》2013年第2期。

② 黄国信：《单一问题抑或要素之一：区域社会史视角的盐史研究》，《盐业史研究》2014年第3期。

局限性，解决其中史料的层累问题。^① 赵世瑜对于史料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追求新史料之风在社会史研究领域体现得尤为明显。究其原因，是区域社会史或历史人类学研究对民间文献的重视，即新的研究旨趣或新的研究取向导致了学界对以往利用较少的史料的关注。对于区域社会史的研究者来说，我们面临着对档案、碑刻、族谱、契约文书也许越来越熟悉，但对正史中的《五行志》《礼志》或者地方志中的《星野》越来越没人懂了的困境，甚至很多常识都变成了谜题。也许更可怕的是，我们手边的资料越积越多，用到下辈子写文章都够，但思想呢？^② 此外，关于区域史还有一些文章论述。^③

对于“华南”概念与区域研究，桑兵有独到的看法。他指出：华南指称的晚出及其内涵外延的变动不居，提示区域研究应自觉使分区概念的形成演化与历史进程相吻合，以免先入为主地削足适履。在谈到区域研究的本旨与流弊时，他认为各省之上的大区划分并非中国历来所固有，主要是近代由域外看中国产生的，大区概念的使用，大都不过为解决当下的问题图个方便或因陋就简，并未深究分区的当否以及意义。这样本无深意的分区，在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海外兴起的中国区域研究中有所发挥。区域研究的初衷，是鉴于中国幅员广阔，差异显著，若是一概而论，难免以偏概全，或是流于支离破碎的状态。只有缩小空间的范围，才能超越大而无当的粗疏或见木不见林的偏蔽，切实求得整体的把握。现有研究大体出现以下不足：其一，用现行的行政区划作为分区的依据凭借，上溯考察该区域的社会历史文化；其二，将所认定的区域内没有事实联系的现象想当然地视为同类并加以归纳；其三，缺乏整体观照，只就局部具体立论，所谓区域性特征，一旦放宽眼界，则或大同小异，或生搬硬造；其四，中国历史文化的统一性无论是空间

① 张小也：《历史人类学：如何走得更远》，《清华大学学报》2010 年第 1 期。

② 赵世瑜：《旧史料与新解读——对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再反思》，《浙江社会科学》2012 年第 10 期。

③ 徐国利：《关于区域史研究中的理论问题——区域史的定义及其区域的界定和选择》，《学术月刊》2007 年第 3 期；李金铮：《区域路径：近代中国乡村社会经济史研究方法论》，《河北学刊》2007 年第 5 期；黄向春：《区域社会文化史研究的视野与经验》，《光明日报》2009 年 12 月 8 日；戴一峰：《区域史研究的困惑：方法论与范畴论》，《天津社会科学》2010 年第 1 期；龙先琼：《试论区域史研究的空间和时间问题》，《齐鲁学刊》2011 年第 1 期；杨念群：《“整体”与“区域”关系之感——关于中国社会史、文化史研究现状的若干思考》，《近代史研究》2012 年第 4 期。

还是层面，都被严重分解。^①

“地方”则是罗志田重视的。他指出：针对大一统下形成的“郡县空虚”，从南宋开始，士人开启了以“礼下庶人”的方式构建下层民间社会的持续努力。这一持续千年的尝试，寓正德于厚生，侧重的是“地方”，强调的是“民间”，提示了从“非国家”视角观察历史的必要和可能。州县的范围，既是人人生活的基本空间（实体的和想象的），也是士绅、职役、家族和地方官互动的场域。“国家”与“民间”、体制与乡俗调和（negotiating）于其间，代表国家者常不行使其功能，而行使国家功能者常不代表国家。在或隐或现的“国家”身影下，逐步形成一种“藉士大夫之势以立国”的取向。在乡之士不仅要化民成俗，还要凝聚社会。“道”与乡土的衔接，使“地方”具有更多自足的意义，减轻了上层政治变动的影响。^②

探讨赣闽粤毗邻地区族群问题的“客家研究新视野丛书”值得关注，其从不同角度体现出了历史人类学与区域社会研究的特色。这套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2015年推出，其中温春香的《文化表述与族群认同：新文化史视野下的赣闽粤毗邻区族群研究》以宋元以来赣闽粤毗邻区的族群为对象，以文化表述为切入点，考察宋元以来文人对赣闽粤的记载，发现宋元到明朝中期，文人尽管对不同族群有所记载，但最多的是关注区域性的动乱；而发展到明代中后期，表述出现转变，开始较多地关注这一地区的族群性差异，并将这种差异渐渐明晰。这种表述转变与明代赣闽粤毗邻区的大规模动乱及明中后期以来的社会重组有关，这种由方志主导的言说其实首源于各姓族谱，而族谱编撰的背后则是一整套文化的逻辑及汉人意识在起作用。邹春生的《文化传播与族群整合：宋明时期赣闽粤边区的儒学实践与客家族群的形成》考察了9—18世纪中原王朝政权和儒家主流文化对赣闽粤边区的渗透和其传播的历史轨迹，揭示了赣闽粤边区的社会变迁与客家族群文化形成的内在逻辑；阐述了国家权力在赣闽粤边区的社会变迁和客家族群文化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并引用文化学的理论，对客家族群的汉民族属性做了学理上的分析。靳阳春的《宋元时期汀州区域开发与客家民系形成》

① 桑兵：《“华南”概念的生成演化与区域研究的检讨》，《学术研究》2015年第7期。

② 罗志田：《地方的近世史：“郡县空虚”时代的礼下庶人与乡里社会》，《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5期。

探讨了汀州的设立及人口变迁、交通变迁、经济变迁、社会变迁、客家民系的形成和发展。黄志繁、肖文评、周伟华的《明清赣闽粤边界毗邻区生态、族群与“客家文化”：晚清客家族群认同建构的历史背景》认为，晚清“客家文化”被建构为“中原正统文化”，明中期以来赣闽粤边界地区普遍经历的“正统化”是重要原因，晚清时期客家人面对的“族谱”、祠堂、“口碑”等文化资源其实是明中期以来赣闽粤边界地区“正统化”的结果。

华北区域社会史研究的面貌发生着变化。赵世瑜所著《小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对于区域史研究有不少心得体会。赵世瑜主编的《大河上下：10世纪以来的北方城乡与民众生活》（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系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课题的结项成果。该书通过大量田野调查，用收集到的众多史料及数据，围绕10世纪以来北方城乡与民众生活的原生状态进行多角度的探究和展示。该书分为移民、身份与生活、寺庙与基层社会组织、宗族建构和村落与乡村关系认同四部分。赵世瑜对华北区域社会史研究有新的设想。他认为，无论是在世界史还是在东亚史上，16世纪都是一个重要的时代。正是在这时，明朝深为“北虏南倭”问题所困扰。学界以往对明代“北虏”问题的解释框架，基本上局限于传统的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冲突史及明蒙关系史。在与其相提并论的“南倭”问题得到新的解释并被置于一个更广阔的海洋贸易史框架后，对“北虏”问题的认识变化依然不大。事实上，在长城沿线发生的、以明朝和蒙古为主角的一系列事件，同样是全球史时代变化的组成部分。“内陆史视角”的观察与思考应成为传统的“海洋史视角”的重要补充。^①他还从区域社会史的角度观察到，明清易代时期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段，各地往往表现为“不清不明”，即不断出现反复而未立即确立某一正统的状态，而这种状态又与该区域历史发展的长期特点有关。^②他还尝试反思清代内亚研究以及华南研究所见之清朝国家认同建构的多元性。^③赵世瑜提出了对北方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看法，并对山西进行了专

① 赵世瑜：《时代交替视野下的明代“北虏”问题》，《清华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

② 赵世瑜：《“不清不明”与“无明不清”——明清易代的区域社会史解释》，《学术月刊》2010年第7期。

③ 赵世瑜：《从移民传说到地域认同：明清国家的形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

门研究。^①

行龙讲述了对于中国区域社会研究“走向田野与社会”的认识。^② 行龙的《走向田野与社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7)是以近代山西社会的水灾、水案、集体化和晋商等专题为中心的区域社会史研究,注重在田野调查中搜集史料、解读史料,展现出历史学对地方社会变迁的关怀。2012年5月,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中心编辑的“田野·社会丛书”四种,即胡英泽的《流动的土地:明清以来黄河小北干流区域社会研究》、张俊峰的《水利社会的类型:明清以来洪洞水利与乡村社会变迁》、郝平的《丁戊奇荒:光绪初年山西灾荒与救济研究》、韩晓莉的《被改造的民间戏曲——以20世纪山西秧歌小戏为中心的社会史考察》。该中心还编有辑刊《社会史研究》。^③

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连续举办了华北区域社会史研讨会,以求把握华北区域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与区域特色。2008年12月12日至15日,举办了“民间文献与华北社会史”学术研讨会。2009年8月20日至23日,举办了“断裂与连续:金元以来的华北社会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④ 该中心的研究侧重于华北乡村社会经济、商品流通、宗族问题,出版专著多种,近期发表了一些代表性的论文。^⑤

① 赵世瑜:《如何深化中国北方的区域社会史研究——〈长城内外:社会史视野下的制度、族群与区域开发〉绪论》,《河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李卫民:《社会史与山西研究的反思——赵世瑜教授访谈录》,《晋阳学刊》2009年第4期;赵世瑜:《圣姑庙:金元明变迁中的“异教”命运与山西社会的多样性》,《清华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赵世瑜:《村民与镇民:明清山西泽州的聚落与认同》,《清史研究》2009年第3期。

② 行龙:《走向田野与社会:区域社会史研究的追求与实践》,《山西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

③ 前两辑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即《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2011),《山西水利社会史》(2012);后两辑改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第三辑于2013年出版,第四辑于2016年出版。每辑栏目分为专题论文、学术评论、资料选编,收录文章约10篇。

④ 常建华:《“民间文献与华北社会史”学术研讨会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9年第5期;常建华:《“断裂与连续:金元以来的华北社会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民俗研究》2009年第3期。

⑤ 张思:《从近世走向近代:华北的农耕结合与村落共同体》,《民俗研究》2010年第1期;许檀:《清代山西归化城的商业》,《中国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1期;常建华:《明清山西碑刻里的乡约》,《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3期;王先明:《试析富农阶层的社会流动——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华北乡村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李金铮:《延续与渐变:近代冀中定县农业生产及其动力》,《历史研究》2015年第3期;李金铮:《矫正不可过正:从冀中定县看近代华北平原租佃关系的复杂本相》,《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6期。

其实，江南区域社会史研究在稳步前行，也很有特色。近年来上海的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师范大学纷纷强调江南研究，南京的南京大学，苏州的苏州大学、苏州科技大学，杭州的浙江大学，金华的浙江师范大学等单位也在从事江南史研究。复旦大学历史系从2008年起每两年举办一次关于江南史的国际学术研讨会，现已举办六届，并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多种会议论文集，有《江南与中外文化交流》（2009）、《明清以来江南城市发展与文化交流》（2011）、《变化中的明清江南社会与文化》（2016）。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于1997年起举办江南社会史国际学术前沿论坛，并于2009年创办《江南社会历史评论》（唐力行主编），由商务印书馆发行，已经出版八辑。该刊是区域社会研究的综合性学术刊物，辟有理论探索、学术评论、江南经济、江南文化、江南社会等栏目。办刊宗旨一是重视理论的创新，尤其是本土化社会史理论的构建；二是重视新资料的挖掘，包括档案、碑刻、口碑、实物资料等；三是提倡研究社会史的新视野，例如在超越地域社会疆界的广阔视野中进行区域间的比较研究、在长时段的视野中研究中短时段的历史事件与人物、在地方社会与国家互动的整体史视野中审视地域社会的变迁等；四是倡导历史评论，在学术批评中推进学术的发展。唐力行等著的《苏州与徽州——16—20世纪两地互动与社会变迁的比较研究》（商务印书馆，2007）强调从区域史研究走向区域比较研究。长期研究江南地域社会的朱小田认为，人类学的独特思路可以导向地域文化研究的纵深发展。地域文化史应加强动态生活的呈现，告别传统的脱离生活结构的习俗史，迈向生活领域；人类学的整体视野提醒人们要特别关注地域社会内部各种不同类型的社群世界，向笼统的“中国社会”或“地域社会”概念提出挑战；人类学赋予社会结构中的任何劳动者以一席之地，要求地域文化观察重视作为民间文化持有者的普通百姓；人类学中习见的口头艺术形式，常常以文献与口头两种形态存留下来，成为地域文化研究的独特素材。^①

此外，华中、西南、西北、东北的区域社会史研究都取得了明显进展，我

① 朱小田：《地域文化史研究的人类学路径——倾向于江南的案例》，《清华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会另外介绍具体的研究成果。但区域史也存在着各区域研究不平衡的现象。^①

空间对于历史学具有独特价值。鲁西奇《中国历史的空间结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运用“空间”的观念与方法，思考“空间”对于中国历史发展的意义，分析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及其空间结构。全书分为区域多样性、核心与边缘、城市与村庄三大部分，分别讨论了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区域多样性、中国历史发展的五条区域性道路、中国历史上的三大经济地带及其变动、王朝的“核心区”及其变动、内地的边缘、边缘的核心、权力与城市空间、乡村聚落形态的演变及其区域差异等问题，多角度、多层次回答了“统一、多元中的中华帝国是如何可能的”这一宏大命题。

跨区域的社会史研究如何进行？吴欣认为：“若将运河研究放置在‘区域与跨区域研究中的生活方式与社会发展’的框架之下，运河区域社会研究历史意义或更为可鉴……民间文献和‘生活方式’视域下的社会史研究，既是运河研究同时也是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希望所在。”^②

值得注意的是，在全球化的今天，社会史的区域研究也把视野投向国外的华人活动与国内及国际的联系性上。郑振满通过考察闽南华侨的跨国生存状态、侨乡社会权势的转移及侨乡社会文化的传承，探讨近代闽南侨乡的国际化与地方化进程。所谓国际化，是指闽南侨乡的社会经济中心不断外移，海外华侨成为闽南侨乡的地方精英，海外世界与闽南侨乡的联系日益密切。所谓地方化，是指闽南侨乡的政治权力中心不断下移，侨乡建设与地方公共事务受到了空前的重视，本地社会文化传统得到了更新和延续。他认为深入研究这一历史过程，对于探讨全球化时代地方传统的发展前景，具有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③ 郑莉着重研究跨国界的文化网络，通过对马来西亚芙蓉坡兴化人的个案研究，探讨同乡同业传统在海外华人社会中的传承与运作机制。^④ 刘永华发现，自19世纪中叶开始，随着上海、宁波等口岸开埠通商，国际茶市对中国茶叶生产与销售的影响日益深入。在市场利好的刺激下，徽州婺源产茶区的一家农户通过增加茶叶生产与制作的劳动力投入，提高了家

① 吴琦：《社会史研究中的区域失衡现象》，《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

② 吴欣：《从“制度”到“生活”：运河研究的新维度》，《光明日报》2016年8月10日。

③ 郑振满：《国际化与地方化：近代闽南侨乡的社会文化变迁》，《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2期。

④ 郑莉：《东南亚华人的同乡同业传统——以马来西亚芙蓉坡兴化人为例》，《开放时代》2014年第1期。